

文学艺术批评

WENXUEYISHUGAIPING

I06
37
1982

1982 文学艺术概评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220266

文学艺术概评

(1982)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4 1/4 插页 2 字数318,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800

书号：10151·694

定价：1.85元

目 录

保持清醒 继续前进

——1982年优秀影片评奖之后的期望 荒 煤 (1)

文艺在前进中

——1982年文艺概述 赵 寻 (21)

读六部获奖长篇小说杂记 江晓天 (29)

论新时期文学及其发展 刘梦溪 (48)

关于文艺反映时代的几个问题 郑伯农 (77)

他们丢弃了女娲的“草绳子”

——漫谈1982年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塑造 行 人 (96)

《人生》和一九八二年中篇小说的主题 刘蓓蓓 (107)

军事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漫评一九八二年反映部队生活的
部分中短篇小说 朱 洪 (134)

报告文学的勃兴与嬗变

——从获奖作品谈几个问题 雷 达 (151)

诗，在现实的轨道上

——1982年新诗创作巡礼 朱先树 (171)

话剧舞台面面观 杜清源 (194)

脚踏实地 移步换形

——1982年戏曲艺术漫评 李振玉 (221)

收获、欠缺与期待

——对1982年故事片创作的几点看法 李兴叶 (248)

电影的美学追求 丁道希 (271)

时代的厚望与探索者的足音

——一九八二年的美术活动 李松 (284)

迈开探索的脚步

——从一九八二年的舞坛创作谈创新问题 胡大德 (300)

一九八二年曲艺创作漫评 戴宏森 (316)

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 段更新 (334)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抽象美”讨论述评 张本楠 (359)

西方现代派文学讨论述评 王庆璠 (386)

略谈当前一些作品的爱情描写 刘爱民 (422)

争鸣中的探索与思考

——一九八二年中短篇小说讨论情况一瞥 李树声 (438)

保持清醒 继续前进

——1982年优秀影片评奖之后的期望

荒 煤

1982年的电影生产，在1981年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总的看，好的和比较好的故事片占三分之一左右。反映当代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题材的影片比较多，比较注意去表演现实生活中普通劳动人民以及青少年和儿童的形象，也比较注意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并在电影艺术的风格、样式、结构、语言、演员的表演、音乐、美术等方面有所追求和探索，的确呈现了题材、人物、风格、样式的多样化、丰富多采百花齐放的景象，也确有一些优秀影片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例如《牧马人》、《人到中年》、《骆驼祥子》、《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风雨下钟山》、《布谷催春》、《城南旧事》、《泉水叮咚》、《应声阿哥》、《春晖》、《飞来的仙鹤》、《逆光》等。

有严重政治倾向和趣味很低下的作品没有了。更可喜的，有些反映十年内乱或反映过去历史性错误的影片，不仅没有使人只是陷于悲惨故事的回忆，而且注意到伤痕的愈合，着重表现人物在苦难中，受到人民的爱护，终于成长起来、相互鼓励、

帮助、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和爱情，表现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恋，愿意为人民、为祖国献出自己的青春，歌颂了他们美好的心灵。

因此，我认为，在中央领导同志要求我们电影生产《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之后，我们去年的生产确实向前迈进了一步。正如我在一月创作会议上所讲的，这是扎实地迈进了一步，这是有可喜变化的一步，这是有所创新的一步。

一年一度的评奖活动，为的是表彰，总结经验，推动创作，使电影事业更加繁荣。评奖的意义，不在评奖的本身，更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整个电影创作还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要继续前进，开创电影创作繁荣的新局面。

周扬同志在文艺界几次评奖大会上的讲话，都强调一方面要奖励，一方面要评论。不要造成一种印象，评上奖的作品不能进行评论；也不要造成另外一种印象，没有评上奖的都不是好的影片。我觉得，精神产品、尤其是电影这种综合艺术的生产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奖励优秀作品，很难象物质生产一样有分毫不差的标准。即使获奖的作品，也还要看到有不足的地方，可以有精益求精的地方。

评奖之后，各厂和所有获奖人员都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些经验。我们对艺术创作既不要简单化，求全责备，也不能只有奖励，没有评论，只说好的，不指出缺点，缺乏严格的要求。应当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

—

这里，我大胆地提出一个问题：领导艺术创作的人员和艺术创作人员，是否可以思考一下，经过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

动，我们是不是牢固地树立了尊重艺术客观规律这样一个观点？我认为，尽管我们拍了一些优秀影片，但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承认文学艺术的客观规律，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既然叫做客观规律，那就是不可违反的，违反了就要受到惩罚。这里，有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搞清楚：我们往往把文学艺术的共同规律和电影艺术的特殊规律混同起来，或者对立起来，看不到二者之间辩证的统一的关系，造成创作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混乱。有的同志偏重于强调电影的特殊规律，电影特性，或特殊的表现手段。认为电影艺术的质量提不高、上不去，关键在于我们对电影的特殊规律认识和掌握不够，以致发展到在电影理论方面要重新探索和建立新的电影观念。不少同志在探索创新的过程中不根据作品反映的内容、题材、样式、风格的多样化，笼统地提出要丢掉戏剧的拐棒，要和戏剧离婚，反对戏剧性，非情节化，甚至发展到认为电影根本不要考虑故事性。好象这样就有了新的电影观念，就掌握了新的电影语言，掌握了电影的特性，电影艺术质量就上去了，这是一种情况。

我认为，今天电影艺术之所以上不去，关键还在于我们不能按照文学艺术的客观规律办事，没有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按照文艺的共同的规律，叙述性的文艺作品中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人物创造问题。创造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永远是文艺中的中心问题。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归根结蒂，在于作品能否创造出真实可信、形象感人的艺术人物。各种艺术都有其特性、特殊规律，表现手段不一，但都是围绕着这一个中心而活动的。电影固然有自己的特性和特殊规律，但不能违背文学艺术的共同规律——创造人物。不管电影艺术手

段、技巧、表现方法多么熟练，多么新颖，但如果违背了这个共同规律，就不能创作出——或者说，不是“电影地”创造出真实、可信、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因此，必须承认，我们电影艺术首先要尊重文艺的共同规律。电影艺术的特殊规律，只是指运用电影的艺术手段来创造人物；或者说，在服从这个共同规律中，电影艺术又有其特殊的规律。这二者的关系不是分割的，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统一的。

也有很少数影片，编导不从生活出发，不注意创造人物，而是从一种意念出发，去臆造人物的命运，借人物之口去宣传所谓哲理。尽管尽量去运用、发挥电影的特性，看来很象“电影”，却遭到失败。总之，掌握电影的特殊规律和特性，如果忽视人物的创造，缺乏鲜明的形象，象电影，但给观众以概念和说教，仍然是本末倒置，不会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第二个概念也需要弄清楚，政治和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或者说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现在在创作人员和理论工作者中也有把它们割裂开的现象，没有看成为一个整体。我们现在不提“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不等于说文学艺术可以脱离政治。我们强调艺术的规律要写人，也不等于说我们只注意艺术的价值，而不考虑写人也还是有它的目的性。在一月创作会议上，我讲应该牢固地树立这样一个观点：文学艺术要写人，同时要感人。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们的历史，三十年来，我们拍了那样多的影片，不能说没有写人，但真正感人的作品不多。写人而不感人——人物的命运、遭遇以及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矛盾、复杂的关系中展示出性格的特征和光辉，对观众的思想感情没有感染力量，那就不能达到树人的目的——以性格培养性格，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目的。长期

以来批评我们作品中的公式化、概念化，无非是这个问题。这种艺术性较差，或者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有没有什么社会价值？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一切，这些作品程度不同地起到一些教育的作用，这是一种简单的宣传、说教的作品，不是通过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人物的命运、遭遇，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矛盾，给人以形象的教育。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来检查一下前一段我们获了奖的影片，从中吸取教训。不要把政治和艺术对立起来，也不要把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对立起来，也不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不要把政治标准第一变成唯一，而是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结合。我们要求提高质量，是既要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又要提高作品的艺术性。提高影片的艺术性，正是为了提高影片感人的力量，教育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前面讲了文学艺术创作要写人，这是共同的规律，要掌握电影的特性去创造人，需要结合起来。写人是共同性，但怎样把人写好，感动人，电影有它自己特殊的手段。我觉得只有艺术家真正掌握了电影艺术的表演手段来刻画人物，才可能产生感动人的力量。所谓感动人，根据不同的题材，人物的不同命运和遭遇，无非达到这样一些效果：或者使人落泪，或者使人思考、激动，或者使人欢乐和鼓舞……。简单说就是以情动人，打动观众的情感，使观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和交流。尽管打动人的程度有深浅，各人的感受不同，但一部比较成功的影片，应该打动人。许多优秀影片也还存在着人物缺乏性格深度的问题。我们常常要求影片要创造真实、可信、生动、鲜明的形象，但很少更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创造这典型形象，需要强调

一下性格的深度问题。我请大家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许多优秀影片还不能感人至深、激动人心，是不是和这个问题有关。我们都知道，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没有个性，没有性格，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人人有个性，不管来自哪个阶级、阶层，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普通人民群众或英雄人物，都有个性、性格。我们要求文学艺术作品创造典型人物，但我们许多作者往往忘记了每一个典型都是“这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没有个性，没有“这一个”，也就没有典型。没有性格的典型，只是文艺家们用概念构成的人物，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陆文婷就是这个陆文婷，正如虎妞就是这个虎妞一样，各有各的性格和个性，也才能成为两种绝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两个妇女的典型。没有陆文婷的性格，没有虎妞的性格，也就不会有这两个典型。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有性格、有个性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典型的人。我们许多作品缺乏性格的深度，或者叫内心世界揭示得不深刻，或者用艺术家的话来说“灵魂深处挖掘得不深”，或者说是性格的单一化，或者说个性色彩不浓郁。归根结蒂，我们现在某些影片中出现的人物更多的是一面面浮雕，还不是四面玲珑细致的一座座雕塑。例如《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刻画得很生动很感人，但如果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也还有所不足，从导演处理、演员表演来看，是不是也可以说，温顺有余，而刚强不足？我绝不是说要在影片里给陆文婷加上若干说教，而是说，忽视了陆文婷性格的本质方面——刚强的一面。比如，有一场戏导演没有抓住，给以有力的表现。就是她在亚芬参加批斗会回来的途中，亚芬说她也不愿参加这种会议了。陆文婷却说，只要手术刀拿在手里就行。这种思想感情是崇高的、朴素的，然而这正是她性格刚强的一

面。如果这场戏表现好了，就使得陆文婷的性格更有深度了。再例如当她给焦部长动手术时，红卫兵冲击病房这场戏，也处理得简单了一些。倘若表现一下她对老干部出自真诚的爱护，又由于职业的道德，比较勇敢机智地对待群众，那么，陆文婷的形象也会更生动一些。又如《春晖》里的凌老师也感到性格单一。我们对性格上的描写往往带有片面性，要表现这个人受难，从头到尾都是一副受难者的形象，看不到他性格的另外一面。而另外一面恰恰是本质的东西。倘若对陆文婷、凌老师，写他们在各种困难条件下能够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中，既表现他们的困难，然而也在一定场合下表达他们在工作中得到的欢乐和安慰，展示他们性格的另一方面，而且是重要的本质的一面，那么，他们的性格可能更完整一些。如果把他们都写成一个没有信念、理想、坚强的性格的人，一味忍受各种困难，任劳任怨的受难者的形象，那倒是歪曲了他们的形象，他们也就会成了一个性格软弱的人物了。再例如，“钟山风雨”影片出现的我们党的领袖形象，也不够生动。

我们许多影片中的人物，不是典型，而是定型化。长期以来造成正面人物不如反面人物形象生动，英雄人物、先进人物不如落后人物形象生动，领袖人物不如群众形象生动，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的文艺作品如果不能达到性格的生动是不行的。性格的单一化，也就是形象的概念化，这妨碍我们的文学艺术创造更生动的艺术形象。对刻画正面人物、英雄人物、领袖人物，还没有摆脱过去“左”的思想影响，首先没有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没有把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描写对象。因此，我们的影片在创造人物这个问题上，思想上还要更加明确起来，把人物的性格挖掘得更深一点。其实，性格的深

度，就是要求不要把性格的特征仅仅当作一种外在的表象，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的表面的东西，还要挖出性格中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反映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

二

特别应该指出，现在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许多影片对党团员和党的各级干部与领导干部形象的塑造，重视不够，即使一些反映当代题材比较好的影片，也存在这个问题。有些影片中，党团员、干部、领导者的形象往往表现得苍白无力，缺乏个性，没有生气，没有力量，仿佛在现实生活和斗争中都无所作为，不起什么作用。这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谁都知道，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中，是我们党把一个经济接近崩溃边缘的国家拯救过来，短短几年，就使得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情况有了极大的好转和变化，并且按照中国的国情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纲领；清理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从各个方面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和作风……总之，无数事实证明，我们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向四化进军的核心力量，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里面都有许许多多优秀党团员、党的干部和领导人员为了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方针所进行的艰巨的劳动和斗争。

当然，不能否认，在生活中也存在着党风不正的种种现象，然而，正确的健康的力量是占主导地位的，是主流。

但是，从银幕上来看，我们很难看到生动鲜明的党团员、

干部或领导者的形象。我想了一下，如《毋忘我》中的农村支部书记，《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解净还有点印象外，真正表现出党员、干部的作用的影片，确实比较少。这里更不用说，党团员和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学习、党内生活等等，其实它与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不能不经常发生联系、纠纷、矛盾……一句话，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排除在影幕之外了。

这绝不是说，我主张不作具体分析，笼统地要求在银幕上去开会、演讲、说教，简单地表现党员干部或党的领导者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能料事如神，一举成功的气魄和力量；我也不是要求重复过去的错误，去搞“三突出”，创造什么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更不是不允许去揭露党风不正的现象，不准批评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不爱惜人才、不尊重人的尊严等等恶劣的作风。

我仅仅是要求，反映我们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表现我们的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党的干部甚至领导人员，首先也是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来描写。他们每个人无论在十年内乱中或是在大转折的新时期，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遭遇和命运，在生活和工作中也会有各种矛盾和斗争，也会有各自不同的欢乐和烦恼、幸福和坎坷、渴望与追求、以及现实和理想、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然而一些优秀的党团员，在某些具体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或具体的环境中，在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方针，在为四化建设遇到种种阻力和困难的时候，他们既是普通人，又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崇高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密切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与人民共甘苦、同命运、

共脉搏的作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终究使他们成为走在时代前头的先行者。他们既身为群众的一员，身在群众之中，然而又的确是群众的带头人。正是这样一批在各个战线上的优秀党团员、干部、领导人成为一股正气凛然，朝气勃勃，敢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开动脑筋，团结广大群众向前看的骨干，显示了党的战无不胜的力量，才能使得我们的事业不断地发展。

应该承认，我们反映三中全会以来这个伟大转折时期的矛盾和斗争的影片还很少，而表现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影片也很少，创造出党团员、干部或领导人的生动鲜明、真实可信的感人形象的影片则更少。

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和思考。

党的领导和力量，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方针，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工作，党所提出的在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的历史性的战略任务，怎么体现在银幕上，通过什么来表现呢？

我认为，就是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当代各种各样的个性鲜明、真实感人的党团员的形象。

这是新中国电影的光荣传统。从《中华儿女》、《钢铁战士》到《董存瑞》、《红色娘子军》、《红旗谱》、《党的女儿》、《永不消逝的电波》、《回民支队》、《上甘岭》、《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直到近年拍摄的《吉鸿昌》、《陈毅市长》、《梅岭星火》等反映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影片，确实创造了许多优秀党团员光辉的典型形象。

但是，反映十年内乱和新时期影片中，至今还很少看到优秀党团员真实动人的形象，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创作人员对现实生活斗争中党团员的作用认识不够，在创作思想，也许还有一种误解：似乎提倡力求真实地再现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力求生活化，表现普通人的遭遇和命运，就没有必要着重表现党团员的形象了，甚至有意无意地去回避党团员的形象，或者在表现党团员形象的时候，采取简单化、概念化的办法。

这种现象和倾向，不利于我们的电影创作更有深度地去揭露现实生活中矛盾和斗争，也不利于我们塑造当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新人的典型。

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努力，最终的目的，无非是通过新人的典型创造，去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我很难设想，电影这种富有群众性的艺术，如果不注意、轻视、忽视创造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光辉动人的典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又怎么能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怎么能培养首先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代新人！

所以，我再一次强调地提出这个重要问题，希望大家认真加以思考和研究。

三

现在有些影片，人物性格塑造得还很不完整，有的缺乏应有的深度，所以产生这种状况，我觉得往往是由于情感的不真实，只是表现感情的结果，而不去表现感情的产生、发展和结局。艺术作品中情感的发展，应该合乎性格发展的逻辑。《飞来的仙鹤》的戏剧情节的产生首先从哪里开始呢？是影片中导

演排芭蕾舞时说芭蕾舞演员白鹭简直不懂得母亲的感情，因此引起白鹭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并去寻找。然后又碰上了一对农村老夫妇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幸福，把孩子让给她。白鹭终于把孩子找回来了，组成了新的家庭。但是后来，编导简直忘掉了一件事情，忘掉了她当初为什么要找儿子，也忘了她在寻找儿子时，特别是那对老夫妇的崇高感情给了她多少感受，这对她演好一个新的节目，作为母亲的情感的表现有了多大的帮助。相反，她演的节目和母亲的感情恢复丝毫没有联系。我记得契诃夫讲过，写话剧，如果在第一幕墙壁上挂了一杆枪的话。这个作家一定要记住这杆枪还要发出子弹。这无非说明，艺术家在构思中安排了这个道具，最后要让枪响。《飞来的仙鹤》的整个故事结构是从白鹭缺乏母亲的感情这个地方把矛盾揭开的，但在最后母亲的感情和她的创作没有联系。其次，对母亲找到儿子的复杂感情也写得不够。尤其当农村老夫妇决定把儿子还给她时，她对人民群众的感情的体会就写得不够。更不用说她的儿子回到身边时的感情写得也不够。

我们的创作人员应该认识到，一种崇高的感情，都是一种思想的体现，都有深厚的思想基础。陆文婷、凌老师的任劳任怨，他们的好的品质，好的感情，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我们有些影片所表达的思想是附加的东西，是说出来的，是要人物从嘴里说出来的，没有认识到人物的思想更多地应该是通过感情表达出来。如果一个人只有思想没有感情，《飞来的仙鹤》中的那对老夫妇可以把孩子送回去而用不着有感情上的矛盾和痛苦，因为他们思想通了。可是，戏之所以动人，这对老夫妇的品质的可贵，感情的真挚，正好是因为他们以崇高的思想品质战胜了个人感情上的矛盾和痛苦。另外，也要考虑你所表现